

29号院



29号院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成长的地方,它的全称是公园北街29号。

在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的最西路北有一条南北方向的街,叫公园北街,相对的路南就是公园南街。在公园南街的终端,是一个很大的苗圃,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改造成现在的满都海公园。

公园北街不太长,最南边靠近公路有一个东西方向的小巷子,这个小巷子里有六七个院落,我家就住在最里边的29号院子里。

从地理位置上看,我家住的院子正南方有公路局家属院,走出去就是新城西街,街对面是新城百货大楼和电影宫。院子的后面则是内蒙古日报社以及它的家属院。院子西面是已经拆掉的绥远城的城墙,还有一条从大青山上流下来的涓涓小溪。西北方向还有一片小树林,树木不高,也不粗壮,野花遍地,叫不出名字的小昆虫出

没在草丛里。林中还有一条斜插而去的羊肠小道。这里虽然比不上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,但那里却是我们儿时游乐的天堂,是我们小伙伴儿心中的百草园。

百货大楼离我家很近,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,在那里可以买到一应俱全的生活用品。至于电影宫,在我的印象里,那是个最热闹的地方。电影宫的大喇叭正对着我家院子,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预报着各个时段要上映的电影片名。那时演电影用的是胶片,影院需要有专人跑片子。我看到跑片子的人骑着自行车,穿梭在市区各个影院,这里一散场,马上就把片子送到另一家电影院,同时把另一部片子带回来。

29号院不是四合院,它是面对面的两排平房,中间是十几步的距离,正房比南房长一些,但南房西边有一个小旱厕,两排房也就整齐了,东面有个大门,由于东

墙倒塌,人们为了抄近路,大门不走专走断墙。

这个院子住着十几户人家,最大的特点是教师多,绝大部分都是小学教师,他们遍布在新城区的各个小学校里,我的母亲就是其中一名小学教师。这些老师特别辛苦,每天往返两

趟,全靠两条腿走路。在学校认真教书,回到家辛苦料理家务,晚上批改作业,一直忙到十一二点。她们对待自己的工作一丝不苟,兢兢业业。

我们院子里的人不论大人,还是小孩,出来进去就像一家人一样,团结友

爱,其乐融融。小孩子们在一块儿,更是像亲兄弟亲姐妹一样,一块儿上学,一块儿放学,一块儿写作业,一块儿劳动和玩耍。为了给家里减轻一些负担,我们相约一块儿到东门外庄稼地里拾麦茬,一块儿到北门外火车站的货场里扒树皮,拿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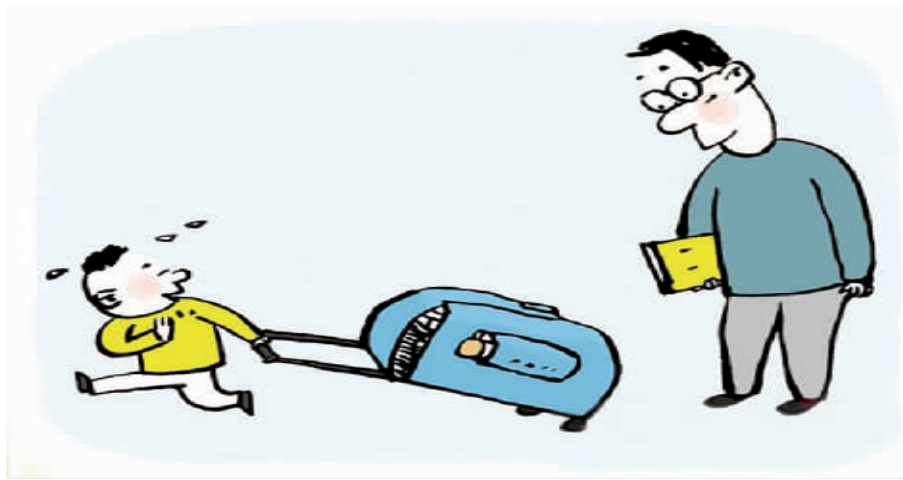
家来烧火。在最困难的日子里,我们还相约去南门外,淌过小黑河去老乡地里买土豆,买圆白菜。现在想起来,小小的年纪真不简单啊!不过,我们也有特别高兴的事,那就是经常到西边人委大院的外墙上摘沙枣吃,吃饱了还能带回两衣兜,心里美滋滋的。

我还在这个院子里学会了劳动技能,像缝被子、做饭、担水、劈柴,为我后来的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如今,29号院已经不复存在了,随着祖国的发展建设,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,昔日的百草园也盖成了花园式的住宅小区。城外的小河、溪流早已被改造成现代化的公园和水系景观。29号的老式院落也已经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取代,我们这一代老了,年轻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,他们过着比我们更加幸福的生活。

文/李娜

书包



书包是用来装书本文具的物件。说起来我也是念过十几年书的人了,却从来没用过书包。

刚解放那年,国民党时期办的陶卜齐完全小学散伙,新政府办的学校还没有办起来,村里有两位热心乡村教育的文化人就分别办起了私塾。一家就办在我家后院的三间空房里,老师叫崔俊盛。没有书,老师就让我们十几位学生带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,有一位带了《论语》。院里有一个不种花的花池。每天除完成规定的背书任务外,老师也教我们写生字。没有纸和笔,就在平铺了干净沙子的花池里用木棍写。每人各拿一本书,都没用过书包。

新学校办起来,一年级学生入学考试是在一个架高了的铁沙盘里写字,

排队写:人、手、刀、尺。我们都顺利入学。一至四年级是语文、算术两本书,作业本是用“有光纸”裁成32开订成的,两本,只用一支铅笔,一块橡皮。三年级开始写作文,增加了一支钢

笔,一个带格的作文本。五六年级增加了历史、地理、自然三本书,不留作业。语文、算术留作业也很少,晚自习就完成了。放学以后,学习用品都整齐地放在书桌里。偶尔有需要往家带的书和本,也只用手拿着,不用书包。遇到下雨天,我就把书本夹在衣服里,紧贴肚皮。上到四年级,比我大4岁的姑姑凭着在解放前念过两年书和一本字典,插班到我们班,她也没用过书包,只用奶奶给的一块小花布拿书。小学6年,村里的学校夏天还放农忙假,冬天上学是“一老响”,早上去学校,中午不回家,下午3点放学,书本文具大都放在书桌里。饭后,就完成“家长作业”:割草喂猪羊,砍柴供灶火……

1953年夏,我和姑姑同时考入绥化市一中(今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),跑校生变成了住校生。书本多了,作业不多,晚自习完成作业后,学习用品都放在书桌里。下午、晚上的自由活动,同学们都在操

场上锻炼,阅览室看书,或者到图书馆借几本课外书回寝室看,也都不用书包。我们班跑校生只有冀正、李其华、常新考、于全河等六七个同学用书包,每天上下学也只带几本当天用的书,其他的放在书桌里。

1956年,我上呼和浩特第一师范学校,住校,书本也放在书桌里。有一年暑假,我怕回农村无书可读,向宋承尧老师借了十几本课外书,是用褥子包起来背回家的。后来学校选送我们十几个师范生直接升入呼和浩特师范专科

学校,学习、生活和在师范时一样,不用书包。

1960年参加工作,我被分配到伊克昭盟(今鄂尔多斯市)东胜,一卷行李,什么都包在里面。半年以后才买了个包——提包。寒假暑假往返探亲上班,就用这个包。在内蒙古师范学院(今内蒙古师范大学)函授后期本科集中面授时,住校,也用这个包。

后来,孩子上学了,跑校,早早给他买了新书包,装两三本书,一个铅笔盒,不重。

再后来,孙子上学了,跑校,他妈妈早早给他买

了新书包,随着年级升高,书包里装的东西越来越多,越来越重。“书山(课本)有路”,还可顺路而行;可再加上五花八门的教辅教材,名目繁多的练习册、课课清、模拟卷……“题海无涯”,波翻浪涌,每当我看到小学生们上下学背着沉重的书包,我这个没用过书包的老学生,不但不羡慕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好书包,反而替他们发愁。

2016年11月18日《北方新报》发表过报社首席记者张弓长的新闻调查《沉重的书包》。文中写到“六年级学生的书包大多

在6至8.5公斤。”有一位学生的“大书包竟然重达9.14公斤。”“记者打开了一名五年级小学生重达7.35公斤的书包,看到书包内除了31本书籍和作业本之外,还有文具袋、彩笔盒、水杯、上计算机课时使用的鞋套。”《沉重的书包》一文中还写到,记者采访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张晓蕾时,张科长表示,“书包过重,自然会影响小学生们的身体正常发育,相关各方应该尽快想办法把书包的重量减下来。”记者还采访了内蒙古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于少飞,于医师表示,“书包过重会让骨骼受损。”“每天背着过重的书包行走,不仅会引起脊柱侧弯或者驼背,还会对身高的正常发育产生不良影响。”

早年,我跑校上学、住校上学的事,不想再多写一字,如今,如何减轻学生课业负担,减轻书包重量,是到了每一位教育部门的领导和所有教师非考虑不行的地步了。文/禹子清